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

Umberto Eco's “Pessimist”concept of sports

魏　伟
WEI Wei

摘　要: 意大利当代思想家翁贝托·艾柯是第一个把欧洲符号学流派与美国符号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符号学大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他在多篇论著中谈到了体育。他文笔犀利,擅长仿讽体,经常正话反说,因此他的话语需要谨慎而细致地解读。通过解读可以感知到他对体育表面上无比严苛的“消极主义”,背后却展现着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体育的情愫,更可以梳理出他的一套完整而充满戏谑色彩的体育观。

关键词: 翁贝托·艾柯; 消极主义; 体育观; 符号学; 仿讽体
中图分类号: G8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2076(2014) 02 – 0013 – 06

Abstract: Umberto Eco, well known first – class contemporary Italian thinker, a real master of semiotician who firstly devoted to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Semiology with American Semiotics. He mentioned sports in many of his articles and books from 1960s to 21st century. His harsh and critical style of writing enchanted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His franchise parody made the readers carefully decoding the surface meaning, which usually signifying the opposite. His attitudes toward sport, so – called “pessimist”, actually expressed his omnipresent concentrations on sport. His complete series of views against sport with banter could be represented through his parody writings.

Key words: Umberto Eco; pessimist; sports views; Semiotics; parody

翁贝托·艾柯是当代欧洲公认的一流思想家,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他为公众所熟知的是他的畅销小说家的身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推出的《玫瑰的名字》《福柯摆》《昨日之岛》和《波多利诺》等小说被译成 47 种文字,几乎成为了畅销小说的代名词。因此,他曾被《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誉为 20 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当然,他最为学术界所熟知的还是符号学家的身份,身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的他曾长期担任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他的《缺席结构: 寻找符号学结构方法》《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 文本的符号学阐释》《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都可谓符号学史上的不朽著作,这使他成为欧洲在世的学者中可能唯一能够与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和巴尔特等思想家齐名的主流知识分子[1]。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用他的学生洛克·卡波齐的话来说,艾柯是那种对许多类型的知识都有贪心占有欲的人,他是几乎所有学术团队都想据为己有,但又时刻担心朝不保夕的人。[2]

足球是意大利的第一运动。艾柯的意大利学者身份和早期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的工作经历很容易让人把他与足球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的几部作品中却弥漫着对足球浓郁的消极主义色彩,他对于足球的批判跨越 20 世纪 60 至 21 世纪。他自己明确提出,

收稿日期: 2013 – 09 – 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体育观”(11XTY004) ,四川省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现代体育传播研究”(13TD0011) 。
作者简介: 魏伟(1975 –　) ,男,博士,博士后,副教授。
作者单位: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Chengdu Sports Institute, Chengdu 610041, Sichuan, China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我这里足球(体育)总是与消极哲学联系在一起"[3]。因此,把艾柯的体育观称为"消极主义"体育观应当是贴切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艾柯是一个经常将反讽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方家,在他的笔墨中充满戏讽之调,他的"仿讽体"(parody)风格充斥着他的各种作品,甚至是学术专著。他在《符号学理论》中对符号学的"谎言理论"定义就被很多学者认为颇具仿讽风格"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无法用以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什么。[4]"1975年,在他的第一本"小记事体"杂文集《误读》英文版出版时他强调,"仿讽体绝对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17年后在他的第二本"小记事体"杂文集《带着鲑鱼去旅行》的序中,他不惜重复了这段话[5],表明自己对"仿讽体"自始至终的偏爱。正如卡波奇所言,艾柯的智慧、文本间性的能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加上他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有时需要读者具备百科全书式的能力来解读他的作品。在他这里,幽默和博学被绝妙地融合在了一起[6]。因此,在对艾柯的作品,尤其是小记事体文章、杂文、随笔和评论集展开解读时,读者应当格外谨慎地处理艾柯编码时的"言外之意",解读出艾柯的真实表意。

事实上,艾柯在《没有冠军的价值》一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蔑视,以及对于全民健身的积极态度和社会应当是全民健身推动力的重要观点。

1 "体育闲谈"不过是政论的替代品

《体育闲谈》写就于1969年,是艾柯作品中较早论及体育的篇章,被辑录在论文集《时装之屋:意大利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艾柯在行文伊始并没有直接言说"体育闲谈",而是肇始于足球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一如既往地以戏谑的笔调强调了足球在意大利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可以占领一座教堂,劫持一位保护着一群失望的天主教徒、一群志得意满的持异见者、一个放纵的左派人士的大主教,传统的世俗政党会透着乐。当人们占领一个政党的总部,那么无论是否显示了团结性,其他党派都会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但一旦足球场被占据,那么教会、左派、右派、国会、法院、中国人、离婚联盟、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都会迅速做出免责声明,而且会将罪犯戴上枷锁"[7]。显然,艾柯在此是在讽谑足球在当代意大利社会中被毫无原则地溺爱。这在之后几十年被现实多次验证。一位足球俱乐部主席后来三次担任意大利总理,足球明星成为这个国度里最被宠爱的人,一次世界杯冠军几乎可以让人们忘却所有由"电话门丑闻"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艾柯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集体感知中的深层区域,无论通过定罪还是哗众取宠的计算,都没有人能够触碰"。因为"一旦这个社会深层结构被打破,所有可能的关联原则通通卷入危机,包含人类在地球业已存在数万年这样的事实"[8]。

艾柯随后界定了什么是所谓的"体育闲谈"。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体育闲谈",其实是对体育媒体的谈论。"作为锻炼和身体活动的体育早已不复存在,或者只因为经济原因而存在。因为让一个运动员跑比拍摄一部电影,让演员假装跑要容易。因此,存在的仅剩对体育闲谈的闲谈"[9]。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成为了一种虚幻。同时,他指出"对体育媒介闲谈的闲谈又构成了一整套法则:作为受众的你只能在星期天早晨听听收音机里他们假装比赛的转播。一些市民聚集在理发店里谈论体育,要么你就只能到比赛发生的地方去听这类谈话了"[10]。在这里,艾柯清晰地表达了对体育闲谈的消极态度。

随后,艾柯让体育闲谈与政论发生了联系。对于体育事件、人物的各种评价、判断、争论、诋毁和赞歌就接踵而至,"于是一场口头仪式正式降临,在这场仪式中,知性力量开始挥洒和中性化;体能消耗告一段落。竞争转向了纯碎的政治层面"[11]。而且,重要的是"对体育闲谈的闲谈带有政论的一切特点"[12]。在政论中,人们会讨论领导人应当做的、他们实际上做的、我们希望他们做的,已经发生的和将会发生的,不一而足。体育闲谈则是把对象由城市(国家)换成了体育场和更衣室。如果说政治话题还有禁忌的话,那么有关体育的闲谈就可以肆无忌惮。在体育闲谈里,男人可以展示自己的判断力、语言暴力、政治竞争力等等。因此,在这里,"体育起到了填补虚假意识的作用"[13]。这被艾柯认为是体育起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体育锻炼的观念开始与体育闲谈的观点混淆起来。闲谈者会将自己等同于运动员,不再感觉到他自己并没有介入体育。而且,他会意识不到他根本不会再介入到体育中去,因为他没有闲谈时的正式工作已经让他本应在体育活动中消耗的体能和时间已经耗尽"[14]。因此,艾柯认为,这里的体育闲谈就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指出的"闲话"。

随后,艾柯将"体育闲谈"与符号学家罗曼·雅克布森的符指过程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些闲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如同日常接触中"你好""谢谢"这样的话语,"也如同一台开着的收音机没有调准点播,嘈杂的电流声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只能提醒大家处在一种传播状态中"[15]。体育闲谈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谈,因为“它是一种不间断的欺骗式的交际话语,总令你在对城市和终结的谈论中收场”[6]。最后,艾柯指出,体育闲谈“实质上就是对浪费的赞美,也就是消费的最高点。消费文明的男性其实消费的就是自己”[6]。

不难看出,艾柯极尽嘲讽之能事对体育闲谈的大肆批判,无疑是真正持否定态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体育闲谈堪称“肿瘤级别”的。这“是‘应酬’语言中的最大偏差类型。因此最终,才有了对所有语言的否定。因此,男人非人性化的肇始或者人类有关‘人文’的观念在一开始就是骗人的”[6]。艾柯在这里得出的终极结论是“体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

2 冠军和锦标主义的狭隘

艾柯于1971发表的《没有冠军的价值》也被收录在《时装之屋:意大利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由于这篇文章没有被辑录在英语、法语和其他主要语言的论文集中,因此几乎被学者们忽略。这其实是艾柯论述自己体育观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尼古拉·阿巴加诺是艾柯在都灵求学时的老师。但艾柯对老师发表在报纸La Stampa上有关体育哲学观点的文章不敢苟同,于是他借用了老师授课时的语言,“要勇于对哲学家的观点展开批判,以维持自己对其教学的忠诚”。[7]

艾柯认为,阿巴加诺对于冠军过于看重,对精英主义过于倚重。在阿巴加诺的眼中,“通过冠军,人们总能得到很多鼓舞和激励,观众也乐于欣赏冠军的表演。因此这些冠军总是参与成功的表演”[7]。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锦标主义思想。这种思潮让普通民众忽略了只有自己亲身参与体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身体锻炼。艾柯认为,那种“沉迷于偷窥别人创造纪录的行为”成为了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情的“神秘替代品”[7]。如果民众留恋于对他人精彩演出的欣赏而忽略了自身的身体锻炼只会得不偿失。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欣赏冠军的表演“让人从更好的身体锻炼中放松下来,并最终把不锻炼的原因归结为压抑”[7]。这事实上恰好是不少欣赏赛场赛事和媒介赛事的体育迷的重要观赏诱因:逃避现实。艾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媒介赛事可能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身体锻炼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

接下来艾柯表达了更为重要的体育观点。他驳斥了阿巴加诺所谓冠军是精英阶层的理论,指出“那些体育观赏者代表的‘贱民阶层’其实才是希腊文明中已经诞生出来的冠军概念”[7]。用通俗的语言来理解,艾柯其实是意指只有全民健身才能够真正强国强种,而不是欣赏几个冠军的表演就能证明国民体质的全面提升。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典型的现实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历史性地获得了金牌榜首席的殊荣。至此,体育激励国民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体育发展的首要目标。诚然,冠军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但它完全无法替代民众自身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这恐怕正是艾柯对自己的老师加以批判的重要内涵。

艾柯随后继续批判阿巴加诺的观点。阿巴加诺认为,“人类从远古至今就是选择的过程,那些组织得更好的,更强壮的,接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就存留了下来。冠军也是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模式”[7]。艾柯认为阿巴加诺的观点是让人们被动接受自然化的选择。但事实上,社会是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方式的。他举了溺水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溺水时只依靠本能,那么他(她)大抵只能身亡了。一个社会如此接受这样的自然选择的话,那么溺水身亡者不胜枚举,“好在文化总在学会游泳之前就已经界定了”。因此,他认为普通民众应当“与救生员和游泳教练分享游泳池”,同时认为社会“不应当抛弃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应当让他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学会游泳”[7]。这恐怕是艾柯体育观的核心价值。社会在对体育的弘扬中应当积极推动它的教化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而不是只让极少数精英掌握体育技能。

最后,艾柯认为“应该给每个人以锻炼的机会”。但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再具有优越的竞技性,会刚好选择从不锻炼的人来参与锻炼,这一切都被认为操控”[7]。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锦标主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们总是只能通过对冠军的顶礼膜拜与体育疏离。

艾柯有关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观点是其体育观的核心内容。与其他论述中有关体育的“消极主义”不同的是,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民众参与日常身体锻炼的必要性。这其实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所谓“消极体育观”的实质。

3 足球并不等同于体育

1978年是阿根廷世界杯年。艾柯在这一年成稿的《世界杯与它的盛况》其实是应L'espresso杂志的邀请撰写的一篇应景式的杂文。这篇文章被收录在论文集《七年之欲》中。在那个足球被万众瞩目的时间,杂志社当然想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来传播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艾柯认为杂志社“不可能有更好和更聪明的选择了”。[8]

艾柯在文章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尽力“撇清”自己与足球的关系,来阐释自己作为异见者的合法身份。他表示“我不爱好足球就像足球也不爱我一样。从童年起,我就是那种‘踢球时专踢乌龙球,或者最理想就是传球到对手脚下,或者执拗地将球踢出场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外，踢出围栏，让足球掉进地下室、河里或是扎进带着冰淇淋香味的大车上'"[8]。显然，艾柯再一次运用起他已经使用纯熟的仿讽体，在这里过度夸张的表达无非是想证明杂志社找了一个他所谓的"绝对外星人观点"来点评足球是多么明智。他用他小时候乞求理性又忠诚的足球迷父亲带他去现场看足球比赛为例，证明了自己与足球是多么的无缘。"星期天中午的寒冷的阳光洒在人和这些东西上，我眼前呈现的是宽广但却毫无意义的进程"[8]。以至于13岁的他就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世界是否只是一部毫无意义的小说。于是在艾柯的笔下，足球成了"目的缺失和所有虚荣心的代名词"，因此他坦承"在我这里，足球总是与消极哲学联系在一起的"[8]。艾柯在论述中第一次提出了"消极哲学"的概念，但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消极"中其实饱含着他对于足球事件的关注。

接下来艾柯话锋一转，突然提到"我绝不是要反对对足球的热情。相反，我还要鼓掌欢迎这天赐的运动"[8]。不过，这似乎只是假象，艾柯用了极端的比喻来讽刺意大利社会中足球至上的各种乱象。"那些在看台上的球迷突发心脏病，那些周末为了名誉而在残忍的身体伤害面前曝光的裁判，那些爬山的短途旅游者被乱石砸坏的车窗玻璃所伤血流满地的场景，那些晚上醉醺醺地超速行驶在马路上的年轻人，站在插满旗帜并严重超载的菲亚特500上，直到连人带车冲进无敌卡车里面"[8]。艾柯几乎用尽毒舌之能事讽刺挖苦与足球相关的所有人和事物。"我对足球的热情一如我喜欢在悬崖边上飙车、疯狂的跳伞、神秘攀岩、用橡皮艇跨越大洋、俄罗斯轮盘赌和服用毒品"[8]。

不过，艾柯很快就把足球和体育运动剥离开来。他指出"体育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它直接调动人的身体，促进体质锻炼。人们可以活动肌肉筋骨，促进血液循环，让自己的肺活量增加到最大值。这是与性爱、哲学反思同样美好的事物"[8]。艾柯在这里阐明了他对体育内涵的理解，自发参加体育运动在艾柯看来从来就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但"足球在这个层面上与体育毫无瓜葛。职业足球已经超越了体育运动的范畴，在这里，足球运动员就像拿着不同薪水的组装线上的工人，球迷们的举动就像一群性痴迷者定期去看别人做爱，或者像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被许诺去看富人们吃冰淇淋"[8]。

艾柯不断地在反讽和正说之间切换，这让一般读者很难把握他究竟意指什么。他给出了很多不愿意回应世界杯为什么会那么病态般地受欢迎和媒体趋之若鹜的原因，但"外部的压力"驱使他不得不做出某种回应，那就是"意大利的舆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球队真正获得一次国际锦标"[8]。在这里，艾柯表面上把这种"外部的压力"指向约稿的杂志社和其他媒体，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压力"又何尝不是自己施加的呢？他持续不断地关注各种与足球和世界杯相关的事件、人物，却囿于自己的学者身份耻于从善如流。这难道不是又一层的反讽吗？为了清晰地划清自己与足球的界限，艾柯不惜又抛出了体育闲谈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阐述。对体育闲谈的痴迷可以淡化人们对政治的关心，是政论最完美的替代品。"它是有限的、严格聚焦的，能允许你站边，表达观点，提出对策，而且不至于因为表达而坐牢"[8]。最终艾柯点出了足球的真正内涵，"对于成年男性来说，就像小女孩儿玩洋娃娃一样，这就是一场有关教育的游戏，它教会你如何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8]。这再一次呼应了前文当中"体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的表述，而且表达得更加清晰具象。

文章的最后不可避免地从足球延伸到了政治范畴。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是被当时阿根廷军政府操控的一届"非常规状态"下的世界杯。艾柯的表达较为隐晦，他指出"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自己是在这样的政府中是很受伤的事情。试想我们都是阿根廷人，一小撮阿根廷捣乱分子在那里不断地提醒大家要一直'消失'，不要在这样一个神圣又神秘的比赛时间破坏大家的欢乐"。于是，艾柯指出"世界杯就像圣诞老人般地来临了，终于新闻里有了一些不是政治类的东西"。最后，艾柯终于提出了自己蓄谋已久的观点"有可能在星期天足球比赛时发动一场革命吗？"[8]

4 不谈论足球不等于不关注体育

在杂文集《第二部小日记》中，艾柯于1990年写就的《怎样不谈论足球》一文似乎又一次印证了他的消极主义体育观。不过这一次他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专注于足球实况转播而且兴致很高，因为我认知到并且欣赏这种高贵运动的所有优点"[9]。文字中的戏谑成分依然浓厚。不过他话锋一转，马上提出"我恨的只是足球迷"[9]。为此，他甚至不惜提出了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来渲染自己对足球迷的抱怨。

艾柯随后提出了他憎恨足球迷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缺点：他会惊异于为什么你不是个球迷，而且他会持续不断地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个球迷一般"[9]。接下来艾柯习惯性地用一系列夸张的类比手法喻指了足球迷与非足球迷之间基本上是处于非对等话语的情境中。对牛弹琴是足球迷与非足球迷之间交流的基本形态，他们无法分享相近的意义和符码，因此对话中充斥着不足解码和过度解码。这与艾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异常解码"(aberrant decoding)[10]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艾柯举例道"那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维亚利怎么样啊”“我一定是错过了。”“可是你今晚不错再过错了，是不是？”“不，我必须要读一读《形而上学》中的 Z 书，你知道吗？就是斯塔吉里特。”“好的，你看了就会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预测范巴斯滕会成为新马拉多纳。你怎么看？当然我还会关注阿尔戴斯[9]。”他的这个例子当然有些夸张，但这是为了证明他随后提出的观点“即使我有三只眼睛，并且在颈背上突然长出一对带绿色鳞片的天线，他也不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这种人对世界万物大抵都熟视无睹，眼睛里只有那个黑白两色的东西”[9]。艾柯在言语之中充满了对足球迷话语体系的嘲讽，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 20 多年前《体育闲谈》中的观点。

不过，从艾柯的话语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读出他对足球事件的关注。“对我来说，如果利物浦球迷到这儿来看球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样我可以用娱乐的心态来阅读报纸”[9]。显然，1985 年发生的“海瑟尔惨案”由混入利物浦队球迷内少数足球流氓造成数十名尤文图斯队球迷丧生，这让所有意大利人都难以忘怀。在这篇文章成文前的 1989 年又发生了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在英格兰足总杯赛的“希尔斯堡惨案”，因此在那一时期，忠诚的利物浦队球迷由于少数足球流氓的存在，几乎成为邪恶的符码。“至少有一些鲜血应该洒在这个马戏团里”。在这里，我们恰好读出的是艾柯对于足球和其衍生的社会事务的关注。因此，“如何不谈论足球”似乎可以理解为“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谈论足球”。1982 年，意大利队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以后，职业足球在意大利真正开始兴盛，全世界多数伟大的球员开始在意大利顶级足球联赛中淘金。足球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几乎成为了意大利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话题，这是令身为知识分子的艾柯感到沮丧的。因此，他用这种批判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在这样一个为足球疯狂的国度里，真正充耳不闻足球的人是几乎不存在的。

5 嘉年华化让体育迷失

在 2007 年出版的艾柯杂文集《虾的步骤：热战争与媒介民粹主义》中，辑录了他在 2001 年 1 月意大利《共和报》上论述的《从游戏到嘉年华》，其中谈到他对体育的态度[11]。“体育已经被嘉年华化……它不再是它本身所意味的插曲（一周一场足球赛和几年才一次的奥运会）而是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它不再是一个以自身为终结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商业企业”[11]。显然，职业足球乃至于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是艾柯对今日体育的重新认知，这种过度商业化让体育正在迷失自己的本质。体育迷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不断获得刺激和嘉年华的机会才能得到满足。

艾柯在揶揄体育的过度商业化的同时，也谈到了兴奋剂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比赛已经转化为一项极度困难的任务，需要服用提高表现能力的药物”[11]。这与意大利足坛、自行车坛和 20 世纪末国际体坛上频繁爆出的兴奋剂丑闻不谋而合。为了抑制兴奋剂给体育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少体育组织从 21 世纪前后开始从之前的尿检过渡到血检。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项目的运动员置若罔闻，对服用违禁药物趋之若鹜，用以不断满足受众嘉年华的需求。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代职业体育存在的弊端。

这段文字最重要的是结尾部分。在这里，他观照到了几十年前对于体育的观点。“在盛大的嘉年华会之前、进行中和之后，是那些观众而不是运动员们在没日没夜地游戏”[11]。这与《体育闲谈》中有关体育观赏者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但细细一想不无道理。那些置身庞大的体育嘉年华会的观众有时看上去比运动员本人更尽兴，他们在这场游戏中让自己在身心方面都得到了释放，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其实，艾柯通过这样的反讽揭示出了当代职业体育的本质，那就是已经由过去纯粹的赛场赛事逐渐转变为赛场和媒介赛事并存，媒介赛事成为主导的事实。当然，嘉年华式的当代体育模式颠覆了传统体育模式，受众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和快感享受，以至于纯竞技的内容在这里已经不再成为主导。

6 艾柯的体育思想对体育科学研究的影响

艾柯在当代欧洲崇高的学术地位使他的体育观对于很多学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芬兰学者莱蒂宁和蒂霍宁的《体育中男性体验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艾柯《体育闲谈》的影响，这一点在论文的注释中有明确的提示[12]。英国学者朱利安诺蒂在论述足球与嘉年华政治中引用了艾柯提出的“大众嘉年华”的概念，这篇论文在足球社会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3]。斯洛维卡夫斯基在论述文化表现与体育吉祥物的时候，用到了艾柯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之后的论文集《超真实之旅》当中的“超真实”的概念[14]，其实这个概念不仅后来被波德里亚大量转述，还成为了人文社会学者论及后现代的一个核心概念。以色列学者本·波拉特在谈到以色列球迷对英国足球的情节时直接引用了艾柯在《怎样不谈论足球》中的篇首语[15]。澳大利亚文化学者大卫·洛弗在谈到流行新闻的组成部分时，也特意将艾柯的“体育闲谈”列为其中之一[16]。以色列学者卡梅利等在探讨足球新闻时，也将艾柯在《体育闲谈》中有关体育本质的讨论作为重要的切入口，这“一整套规则”成为了作者理论的核心[17]。丹麦学者汉斯·邦德在谈到体操运动文化的符号意义时，也借用了艾柯早期在《缺席结构》中的符号学思想[18]。英国学者特里弗纳斯在出版的小册子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翁贝托·艾柯与足球》中,集中论述了艾柯的足球思想与符号学的关系[19]。但他的观点后来也遭到了美国学者埃弗隆的批判。他借用贡布里希对运动之美的描述否定了特里弗纳斯认为"足球在介入文化本体的时候,对作家和思想家而言的智慧途径来说既是隐喻又是主题"的观点[20]。英国学者桑德沃斯则运用了艾柯的"超真实"观点来分析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对于赛事场赛和媒介赛事的不同需求[21]。英国学者阿姆斯特朗等在论述足球俱乐部的队歌时也运用了艾柯的这一理论[22]。

此外,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也被运用到体育科学研究中。例如,沃特雷在探讨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运动主义时就借用了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的符号学理论[23]。魏伟在对体育符号的综述中也不可避免地借用了艾柯的符号学观点[24]。事实证明,虽然艾柯在对体育的论述上远不如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那么全面透彻,但这些观点对于体育科学研究来说依然是相当重要的。

7 结语

翁贝托·艾柯是当代西方少有的以抨击体育,尤其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为乐趣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笔下,体育总是与无聊、浪费、虚荣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只看到了事件的表象,很容易被他的隐喻和仿讽体所蒙蔽。他其实一直在关注与体育相关的人物、事件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还批判过冠军和锦标主义,并支持全民健身的观点,还指出社会应当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说艾柯持消极主义体育观,那么这个消极主义有必要被加上引号。在运用仿讽体和反讽的修辞手法上,艾柯可能鲜有对手。当他号召大家不再谈论足球的时候,他却端坐在家中,安静地欣赏星期天下午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的比赛。因为在他看来,符号学就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因此,这样的"消极主义"体育观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Peter Bondanella. Preface [C]. Peter Bondanella. Umberto Eco and the Open Text: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xi.

[2] Rocco Capozzi. An Introduction to Umberto Eco [M]. Rocco Capozzi.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XVIII.

[3] Umberto Eco. Il Mundial e le Sue Pompe [C]. Umberto Eco. Sette Anni di Desiderio. Milano: Bompiani, 1983: 40 – 44.

[4]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58 – 59.

[5] 安贝托·艾柯. 带着鲑鱼去旅行 [M]. 殳俏,马淑艳,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3.

[6] Umberto Eco. La Chiacchiera Sportiva [C]. Il Costume di Casa. Milano: Bompiani, 1973: 237 – 242.

[7] Umberto Eco. Volari Senza Campioni [C]. Il Costume di Casa. Milano: Bompiani, 1973: 262 – 264.

[8] Umberto Eco. Il Mundial e le Sue Pompe [C]. Sette Anni di Desiderio. Milano: Bompiani, 1983: 40 – 44.

[9] Umberto Eco. Come non Parlare di Calcio [C]. Il Secondo Diario Minimo. Milano: Pombiani, 1992: 137 – 138.

[10] Umberto Eco. Towards a Semiotic I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C]. Tobby Miller. Televis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2. London: Routledge, 2003: 4.

[11] Umberto Eco. Illuminismo e Senso Comune [C]. A Passo di Gambero: Guerre Calde e Populismo Mediatico. Milano: Pombiani, 2006: 74 – 75.

[12] Arja Laitinen, Arto Tiihonen. Narratives of Men's Experiences in Spor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1990, 25(3): 185 – 202.

[13] Richard Giuliannotti. Football and the Politics of Carnival: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Scottish Fans in Sweden [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1995, 30(2): 191 – 220.

[14] Synthia Slowikowski.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Sport Mascots [J].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1993, 17(1): 23 – 33.

[15] Amir Ben – Porat. Overseas Sweetheart: Israelis Fans of English Football [J].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2000, 24(4): 344 – 350.

[16] David Rowe. Accommodating Bodies: Celebrity, Sexuality, and "Tragic Magic" [J].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1994, 18(1): 6 – 26.

[17] Yoram Carmeli, Ronit Grossman. 'It's a Game between Jews and Arabs': Soccer Journalism, Otherness and Abjection in the Israeli Context [J]. Culture, Sport, Society, 2000, 3(2): 23 – 43.

[18] Hans Bonde. Farmer's Gymnastics in Danmark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 Semiotic Analysis of Exercise on Moral Action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of Sport, 1993, 10(2): 193 – 214.

[19] Synthia Slowikowski.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Sport Mascots [J].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1993, 17(1): 23 – 33.

[20] John Efron. 'Critique of Pure Football' [J]. Sport in History, 2008, 28(1): 123 – 150.

[21] Cornel Sandvoss. A Game of Two Halves: Football, Television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148 – 151.

[22] Gary Armstrong, Malcolm Young. Fanatical Football Chants: Cre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arnival [J]. Culture, Sport, Society, 1999, 2(3): 173 – 211.

[23] Sebastião Votre. On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A Semiotic Analysis of J. A. Mangan's Approach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J]. Culture, Sport, Society, 2000, 3(3): 1 – 24.

[24] 魏伟. 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述评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 38(8): 1 – 6.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